

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建构： 论《醒梦活海》中的伦理反思

Constructing a Community of Life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Ethical Reflections in *The Living Sea of Waking Dreams*

李永平 (Li Yongping) 邱玉祺 (Qiu Yuqi)

内容摘要：《醒梦活海》是澳大利亚作家理查德·弗拉纳根在2014年摘得布克奖之后的力作。作家以魔幻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以主人公身体部位的“消失”，将自然生命灭绝与人类内在生命价值的荒芜两条伦理线交织在一起，对这双重危机进行反思。最终作家指出，造成双重危机的根源是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断裂。基于此，弗拉纳根在作品中呼吁人们重新审视人类主体性，重塑以共生、共存为核心的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意识，以此来完成对自然世界与人类自身的拯救。

关键词：《醒梦活海》；理查德·弗拉纳根；文学伦理学批评；生命共同体

作者简介：李永平，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文学人类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文学跨学科研究；邱玉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领域为文学人类学、文学伦理学批评。

Title: Constructing a Community of Life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Ethical Reflections in *The Living Sea of Waking Dreams*

Abstract: *The Living Sea of Waking Dreams* is a masterpiece by Australian author Richard Flanagan, following his Booker Prize win in 2014. The author uses magical realism to intertwine two ethical threads - the extinction of natural life and the desolation of human intrinsic life value - symbolized by the “disappearance” of the protagonist’s body parts. The novel reflects on this dual crisis. Ultimately, Flanagan points out that the root cause of this dual crisis is the rupture of the community of life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Based on this, Flanagan calls for a re-examination of human subjectivity in his work, and the reshaping of a sense of community between humans and nature centered on symbiosis and coexistence, in order to save both the natural world and humanity itself.

Keywords: *The Living Sea of Waking Dreams*; Richard Flanagan;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 Community of Life

Authors: **Li Yongping** is Professor at School of Literature,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119, China). His academic research focuses on Literary Anthropology,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world literature and interdisciplinary literary studies (Email: 276319866@qq.com). **Qiu Yuqi** is Ph.D. Candidate at School of Literature,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119, China). Her academic research focuses on literary anthropology and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Email: adqiuuyuqi@163.com).

引言

文学伦理学批评是中国学者聂珍钊在融汇西方伦理学与中国道德批评的基础上创建的一种批评方法。在文学伦理学批评中，文学是特定历史阶段社会伦理的表达形式，文学在本质上是关于伦理的艺术，文学的价值通过文学教诲功能的作用予以体现。¹ 聂珍钊指出，“在具体的文学作品中，伦理的核心内容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自然之间形成的被接受和认可的伦理关系，以及在这种关系的基础上形成的道德秩序和维系这种秩序的各种规范。文学的任务就是描写这种伦理关系和道德秩序的变化及其引发的各种问题和导致的不同结果，为人类文明进步提供经验和教诲”（《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13）。

理查德·弗拉纳根（Richard Flanagan）是澳大利亚当代杰出的作家、社会活动家，他的文学作品包含着丰富的伦理内涵。弗拉纳根常通过文学将其伦理思想践行到公共生活的层面，发挥文学的道德教诲作用。在《醒梦活海》（*The Living Sea of Waking Dreams*, 2020）² 这部小说中，弗拉纳根集中书写了人类所面临的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的失衡。弗拉纳根将小说的发生地放在受森林大火影响的塔斯马尼亚小镇，主人公安娜（Anna）的母亲因为身患疾病正在走向生命的终点，在陪护母亲的过程中，安娜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作家运用魔幻现实主义的手法以安娜身体部位的消失隐喻自然界生灵的灭绝，象征人类内在本质的荒芜，最终指向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断裂，为其批评西方传统的伦理价值判断，抒发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思想创造了富有张力的叙事场域。由此，本文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的方法，结合生态批评的视角，阐释弗拉纳根在小说中书写的自然危机与个体危机，探寻引起危机的伦理根源，讨论其伦理救赎思想并印证其解决危机的伦理方案。

1 参见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 Basic Theory,"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2 (2021): 189-207; Nie Zhenzha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Sphinx Factor and Ethical Selection,"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3 (2021): 383-398; 聂珍钊：“人文研究的科学转向”，《文学跨学科研究》4（2022）：563-568等。

2 书名为笔者自译。

一、外部自然生命的灭绝：人与自然伦理关系的失衡

作为澳大利亚绿党¹的一员，弗拉纳根始终关注着人与自然的联系。在《醒梦活海》中，弗拉纳根以2019-2020年澳大利亚夏天的生态灾难为伦理环境，集中又全面地书写了澳大利亚自然界的崩溃危机，即气候剧烈变化下的山火频发和物种灭绝。

在小说开篇，弗拉纳根援引约翰·克莱尔（John Clare）²的诗歌，为读者呈现出一幅荒凉破败的画面，“掠夺者和自私自利者斧下的猎物，水莲木步道和老橡树小径上，亭亭立如祭司的空心木，已是烟雨，如暴君拿破仑一般独裁，片甲不留。灌木、丛林、山丘早已夷为平地，为这些叛徒高挂起鼯鼠——只有溪流潺潺如故只有溪水还在流淌，孤独静默，冷若冰霜”（1）³。在克莱尔诗作谱写出的荒凉基调下，承接诗歌中衰败景象的是处在大火包围中的霍巴特。“闪电风暴持续了好几天，数以千计的闪电在各地点燃了小火苗。曾经湿润的、神秘的雨林世界，现在变成了一片枯地。火势在无情地蔓延，随之而来的是笼罩一切的烟雾、灰尘与煤渣”（12）。在山火的逼近中，霍巴特的气温日益升高，浓烈的烟雾席卷了整个小镇，越来越多的动物正在走向灭绝。

弗拉纳根不仅直接书写了山火蔓延所造成的令人恐惧的画面，还借助主人公安娜的自身经历或间接体验，向人们呈现了大火中物种灭绝的惨象。安娜每天早上醒来都会看到铺天盖地的大火燃烧过后，在民宿床单上留下的斑斑点点的灰烬，“大火将岛上的古老城市烧成了如同古老的蕨类和桃金娘叶一般的微小碳化碎片。在她的触摸下，这些斑斑点点消失了，变成了一抹烟尘。曾经有着千年历史的比利王松和古草树、铅笔松树林、潘达尼树丛以及稀有的山兰花都消失了”（13）。社交软件上布满了用户上传的无数动物生命消亡的视频，“在社交软件 Instagram 上，数以千计的标志性鸟类——红罗汉、黑凤头鹦鹉、漂亮的小鸣禽——在大火中被烧死，被吹到海里，然后被冲回海滩，融入一层层湿润的、黑灰般的残骸中”（145-146）。在霍巴特，烟雾与灰烬笼罩一切，遍地腐尸，无一丝鲜活生命的征兆，扑面而来的是死亡的气息。弗拉纳根尽力捕捉这些生命消亡的时刻，运用细致入微的视觉描写，将物种灭绝变得清晰可见。

人作为自然世界的一部分，其生存境况必然会在自然环境的恶化中变得岌岌可危。弗拉纳根调动了视觉、触觉、嗅觉、味觉等观感，对环境恶化的恶果进行了立体式的实景渲染，以此书写环境恶化后对人类造成的负面影

1 澳大利亚绿党由绿色环保运动发展而来，其所倡导的是“绿色政治”的理念，即在对人类中心主义的传统发展模式进行反思的基础上，提倡生态优先的政治理念。

2 约翰·克莱尔（John Clare），19世纪英国农民诗人，其诗作常以对自然的热爱、对工业文明的批评为主题。

3 本文有关《醒梦活海》的引文均来自 Richard Flanagan, *The Living Sea of Waking Dreams* (London: Penguin Random House UK, 2020)。引文均出自笔者译，以下引文仅标注页码，不再一一说明。

响。大火所产生的烟雾以一种恐怖的方式笼罩着世界，“烟雾笼罩着每一条街道，充斥着每一个房间，污染着每一顿食物；如焦油般的、如硫磺般的、刺鼻的烟雾烧灼着每个人的喉咙，充斥着每个人的嘴和鼻子，阻挡了夏天温暖的气味。这就像和一个长期患病的烟民生活在一起，只不过这个烟民就是这个世界，而每个人都被困在他那污浊的、崩毁的肺里”（12）。弗拉纳根将自然世界比喻为“烟民”，用“烟民污浊的肺”比喻在烟雾笼罩下的霍巴特，突出了霍巴特当下生存环境的肮脏与污浊，使读者能够清晰地感受到身处其中的人们的窒息感。同时，以人体比喻自然世界又突出了人类与濒临崩溃的自然界之间的相互联系。

人与自然世界在本质上是共生共存的，生态危机最终会演化为人类生存危机。在深究危机发生的原因时，弗拉纳根指出，我们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但是，我们的傲慢与虚荣心将我们与其他生物区分开，这正在摧毁我们，使得我们正面临一个灾难。“傲慢”、“虚荣心”分别对应了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意识与利益最大化的伦理判断，二者会造成人与自然原本和谐的伦理关系的失衡，从而导致人们做出错误的伦理选择。

人与自然伦理关系的失衡具体表现之一，是以人类中心主义为主导地位的西方传统伦理观念，这一观念缺乏对自然的伦理道德关怀。传统的西方伦理学着重强调的是人与人及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法则与道德关怀，并未将自然世界的生灵包括在内。西方伦理学的先驱亚里士多德将自然看作人类的工具。这种将自然看作工具、割裂人与自然一体相依性的目的论，在启蒙时期进一步得到扩张。自启蒙始，人类主体性与理性能力成为哲学、政治和社会话语的中心。笛卡尔更是高扬主体性哲学，认为凭借人类的理性思维与实践哲学，可以充分利用自然界的力量，“成为支配自然界的主人翁”（笛卡尔 49）。可见，传统的人类中心主义伦理，造成了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缺乏对自然世界的道德关怀，更不必说承担起对自然的应负之责。

人与自然伦理关系的失衡具体表现之二，是以资本逻辑为核心的经济伦理在澳大利亚社会中占据主导地位，受资本逻辑的驱使，资本家、政府为了实现资本增值，会无视生态伦理和生态责任，加剧对自然界的侵害与掠夺。塔斯马尼亚原本拥有丰厚的原始雨林资源，但在澳大利亚政府大力发展煤炭经济的背景下，塔斯马尼亚的伐木公司从上世纪末就开始对原始森林进行彻底破坏。甚至面对在山火中资源即将枯竭的霍巴特，政府依旧在“呼吁开采更多的煤矿，建立新的燃煤发电站，如果你对此进行抗议，他们会控告你妨碍煤炭开采罪，让你坐 21 年牢”（6）。上述人为所采取的极端伦理选择与破坏自然的行为，其目的都是为了实现经济利益的最大化。

在弗拉纳根笔下，以唯我论哲学为核心的人类中心主义伦理和以资本逻辑为核心的经济伦理共同破坏了原本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相依的伦理关系，使人与自然的关系从最初的和谐走向对立。恩格斯曾向人们发出警告，“我们

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313）。人们对大自然进行控制与掠夺，严重破坏了自然界的生态平衡，又反过来给人类的生活带来了生存危机。原本塔斯马尼亚有着由原始雨林组成的独特的自然世界景观，而现在的塔斯马尼亚被烟雾、煤渣、灰烬笼罩，街道上充满了无家可归的人。从之前美丽的自然世界变成今天如同地狱的衰败城市，这是人与自然伦理关系失序所产生的恶果。

二、内部生命价值的荒芜：人与人伦理关系的断裂

除了以细腻写实的笔法描绘山火蔓延、生物灭绝的末日般景象，揭示人与自然伦理关系的失衡外，更重要的是，弗拉纳根还揭示了当下人与人伦理关系的断裂与失序。人与自然在本质上是共生的。人对自然的实践会反作用到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关系的疏离与对立，其背后必然反映的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冷漠、疏离甚至对立。弗拉纳根在小说中以安娜为中心，描绘了主人公压抑情感、内部自然破碎后的人性异化与所造成的家庭伦理关系的失序。

“自然”一词从广义上看，包括外部自然和内部自然。外部自然指物质的自然世界，内部自然则指向人类的精神生态世界，一个完整的内部自然应该是“感性与理性、知觉和思维的高度统一”（刘蓓 23）。人的肉体生活与精神生活都与自然界息息相关，外部自然世界的衰落与人类内部自然的衰退是同时发生的。在弗拉纳根笔下，人类内部自然的破碎与衰退主要表现为对工具理性的推崇和对情感的贬抑，以及由此造成的人性异化。

人性异化首先体现在安娜身上，安娜一直以人的“理性本质”来要求与约束自己，并极度压抑着自己内心的情感。她是一位制定计划、按计划行动的、富有的女建筑师。寥寥数笔，弗拉纳根就塑造了一个以“理性”为信条的现代人形象。小说中的“理性”概念，是一种走向极端的工具理性。在西方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中，现代人通过理性思维摆脱了神与自然世界的束缚，但又忽视了价值理性，将自己围困于工具理性之下，不仅以此统治与支配着自然世界，更反过来支配人类自身，压抑着人类的内部自然。“我们把一切事物，包括我们自己，都认定为计划和控制的可能对象”（库尔珀 23）。安娜压抑情感，服从生活中的各种计划与数据表格等行为，都体现了工具理性计算性思维对人类的支配。

在这套工具理性法则的支配下，安娜失去了正确的伦理认知，会做出错误的伦理选择。小说中的安娜主动放弃了作为女儿、作为母亲的伦理身份，拒绝承担家庭关系中的伦理责任。作为女儿，当母亲重病，安娜第一次看望躺在病床上的母亲弗朗西时，“她感到的不是怜悯，而是反感，是一种奇怪的恐惧”（24）。她拒绝承认病床上的母亲。作为母亲，安娜强迫自己专心工作，漠视了年幼的儿子格斯对母亲的需求，没有承担起作为母亲的伦理责任。在格斯以各种理由想要获得她的陪伴时，安娜只会拒绝格斯并冷漠

地关上房门，她完全无视了格斯的情感需求。

人性化同样体现在安娜的兄长特佐身上。安娜曾形容特佐身上有一种“密不透风似的冷酷”（110）。特佐的“冷酷”主要表现为对“理性”的极度推崇与对人的物化。特佐将“理性地生活”视为最高理想，在他看来，爱这种情感会影响理性的思考，带来不可控制的结果，他要时刻压抑自己的情感，让自己处于可控的状态。此外，作为一名大资本家，特佐做出的伦理选择，还会受到资本逻辑思维的影响。特佐习惯性地根据物质财富来判断个人价值。他鄙夷落魄的长兄汤米，用金钱带来的话语权压迫汤米，甚至将汤米视作家庭的污点，将家庭之爱视作影响他们尊严的“污垢”（41）。在工具理性思维与资本逻辑思维的影响下，和谐的家庭关系在特佐那里，异化为了控制与被控制、物与物的关系。

和谐的家庭伦理关系是由家庭之爱支撑的。然而，在以安娜为中心的两个家庭中，家庭伦理关系变得扭曲，家庭之爱也失去了正常的表达形式。安娜与特佐都主动斩断了人类最为重要的情感——爱，无论是爱自己，还是爱他人。他们无法通过爱与家人建立亲密关系，也无法形成健全的人格。安娜在反思的过程中，察觉到自己好像“缺乏大家认为理所当然的东西，一些必要的人性、同情心或同理心”（25）。特佐则绝望地感到“他的内心已经死了”（111）。安娜与特佐的人性异化，共同体现了在失去价值理性的道德关怀引导下，人的人性因子向兽性因子的转化。文学伦理学批评所定义的理性，是以道德准则为基础，追求真善美的价值理性，而当下澳大利亚社会所推崇的“理性”，是以工具价值和经济准则为基础的。在他们身上，爱这种人类本能的自然情感被极力压制，又缺乏价值理性将本能的爱转化为道德情感，就更加无法形成由爱产生的对自我、对他人的关怀，最终就会导致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的失序与断裂。

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断裂带来的严重后果，突出地体现在安娜与格斯的母子关系上。安娜与格斯之间母子伦理的断裂，最终导致了格斯的“消失”。当从小缺乏母爱的格斯长大成人后，他把自己隔离在房间里，拒绝与安娜交流。当安娜想要缓与格斯之间的关系，主动推开格斯的房门时，发现格斯“一只眼睛和两只耳朵已经消失了。只剩下了一张嘴和一只莫名漂浮在脸部中间的眼睛，哀怨又空洞地盯着她”（204）。格斯身体的“消失”意味着安娜再也无法接近、触碰格斯，象征着母子二人无法通过爱进行联结后，最终走向疏离的结局，更象征着格斯内在生命力的衰落。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的断裂，会导致人与人关系的陌生化，无法形成与他人的共同体关系。这一结果最后作用于人自身，就是个体处在一个陌生、疏离又孤独的世界，最终会造成个体内在生命的荒芜。

弗拉纳根用人体部位的消失来象征人与人之间的疏离、人类内在生命的荒芜。消失现象不仅发生在格斯身上，还发生在安娜身上。最初，安娜的一

根手指在无知无觉中离奇消失了。随后，安娜的膝盖、大腿、左胸也消失不见了。并且，身体部位消失这一病理化现象正在社会中逐渐蔓延。为安娜治病的护士失去了耳朵、公交车上的乘客失去了手指，但人们对此无知无觉，没有人注意到消失现象，仿佛一切如常。没有人意识到自我和他人的身体部位正在“消失”，这象征着人内在生命价值的破碎及人与人关系的陌生化。

弗拉纳根在小说中以安娜的家庭为故事中心，通过描写家庭这一社会最小组成单位中，安娜、特佐等人的人性异化、家庭伦理关系的扭曲及家庭亲密关系的断裂，反映了当代澳大利亚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和谐伦理关系的断裂。继而，弗拉纳根通过“消失”这一病理化现象的发生与蔓延，呈现了现代生存境遇下，人与人之间和谐伦理关系断裂后带来的严重后果，即，每个人都处在无人关注的孤独境地，最终结果则是人内在生命价值的荒芜与生命本质的消解。

三、伦理秩序的重建：走向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弗拉纳根剖析澳大利亚现状，无论是书写外部自然生灵的灭绝，还是书写内在自然生命的荒芜，其深意在于揭露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伦理关系的失衡。此外，作家独具匠心地将安娜身体部位的消失与生灵灭绝联系起来，暗示我们生态危机和人性危机之间的联系。安娜的膝盖消失了，“就像黑牛、袋鼠、无烟的夏天一样消失了，再也不会回来了”（79）。安娜身体部位的消失在小说中有三重象征意义，其一是生灵灭绝；其二是人类内在本质的破碎与不断衰落；其三是人与自然共同体相依性的断裂。

弗拉纳根通过安娜身体部位的消失将对物种灭绝与对人性异化的反思交织在一起，指出人与自然、人与人伦理失序的根源都在于西方传统的伦理价值观念造成的人与自然的二元对立。然而，无论是自然界非人类物种的生命还是人类的生命，在本质上是共生的。人对自然界的征服也会随着主体性的无限膨胀蔓延到对人的征服、对人内部自然的统治之上，就会造成人与人、人与自身本质的日渐疏离，会导致外部自然环境恶化和人内部自然退化，最终演变为对生命的冷漠，生命意义的消解，走向自我毁灭。

弗拉纳根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严重后果，在书写危机的同时，也提供了一套解决危机的伦理方案。本书中一个清晰的伦理指向是重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恢复人与自然之间的天然联系。弗拉纳根反对以人类中心主义为主的传统伦理意识和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机械论认知观念。呼吁人重回自然，与万物相联系，建立人与自然共同体的生命伦理观。需要强调的是，弗拉纳根虽然否定极端的人类中心主义，但从来不愿失去人类主体性，并提醒人们要在非人类中心论中重新审视人在与自然关系中的主体性地位。所有人与自然问题的产生都是人类伦理选择的结果，在人同自然的关系中只有人才是主体，只有人才能建立维护自然秩序的伦理规范。为此，我们只有以人与自然

生命共同体的伦理观念改造人与自然对立的观念，并在此基础上主动承担起对自然的伦理责任，才能够作出正确的伦理选择。

具体而言，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思想包含两个部分。从理论层面讲，是以万物共生平等的理念敬畏生命；从实践层面讲，是人重新审视主体性的地位。在人与自然，人与人相处的过程中，从剥削、压迫的索取型主体性走向依赖、共存的责任型主体性，积极肩负对自然、对他者的伦理责任。只有如此，才能建立人与自然、人与人休戚相关的生命共同体，实现生命意义上的道德至善。

为了进一步阐明他关于生命共同体的伦理观念，弗拉纳根安排安娜踏上了自我反思与觉醒的道路。弗拉纳根擅长在小说中塑造两组对立的人物形象，提供两组不同的正反伦理案例。与安娜、特佐的异化形象不同，他们的外祖父、动物保护项目负责人丽莎·沙恩是与自然亲近之人，并共同成为安娜反思觉醒路上的双重救赎。

安娜的第一重救赎来自外祖父。外祖父每天早上都会跪在梅尔罗斯山、巴斯海峡浩瀚的海洋和罗兰山之间，“那个小小的跪姿让他的灵魂充满了海一般的蔚蓝，山峦的群青，他好像成为了土地、充满生机的森林和庄稼之间的纽带”（117）。外祖父是渺小的，但当自然之景在他身上融合之后，他的身上仿佛展示了巨大的宇宙，“这是人与世界彼此相融的力量”（118）。外祖父以跪姿面对群山，体现了其对自然万物的敬畏与爱，并在这种大爱中，实现了人性与自然性的统一。我们的自我与人性并不仅存在于我们自身，还存在于我们与世界万物的对话中，存在于我们与世界的普遍联系中，只有超越二元对立，融入自然，才能够实现自我统一。

安娜的第二重救赎来自“拯救橙腹鸚鵡”项目的负责人丽莎·沙恩。丽莎是第一个发现安娜的身体在不断消失的人，这也意味着丽莎自身人性的完整性，才能发现消失现象，并对“消失”进行抵抗。丽莎采取的抵抗行动，体现在对动物生命的拯救和对人性之爱的拯救上。丽莎及其团队的救助行动，是重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积极行动。橙腹鸚鵡这种野外不足20只的鸟类，在小说中既具有真实性又具有象征性，真实性在于受人为因素的影响，这一物种在现实中濒临灭绝，象征性在于橙腹鸚鵡已经符号化，承载着人与动物共存的和谐理念的隐喻。同时，对橙腹鸚鵡的拯救行动也象征着人性之爱的复归。当安娜问丽莎为何要费力救助橙腹鸚鵡时，她告诉安娜，“真正在消失的不是鸟类、鱼类、动物和植物，而是爱”（191）。丽莎所说的爱，是一种在敬畏生命意识上形成的对万物生命的爱，是一种带有责任感的道德性的爱。这种将人与人之间的爱延展到人与动物之间的道德性的爱，为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关系的形成提供了纽带。

事实上，弗拉纳根还借助丽莎，向安娜传递了第三个伦理案例，即在人错误的伦理行为中，人类从最初与自然的和谐共存走向对立。丽莎以原住民玛蒂娜（Mathinna）的故事为例，向安娜讲述了从原住民时期人与自然和谐

共存到现代社会人与自然的割裂。玛蒂娜是居住在戴维港原住民中的一员，原住民珍惜脚下的土地，维护平原与森林的活力与生机，与生灵和谐地生活在一起，玛蒂娜也与成千上万只橙腹鸚鵡生活在一起。玛蒂娜的生活象征着生物平等主义观念下，人与自然共生的美丽图景。然而，西方殖民者入侵后屠戮原住民、践踏平原，对人与自然都施加了暴力，森林被砍伐，土地被开垦，鸟类也逐渐消失了。自此，人与自然的关系被割裂，自然世界的美也逐渐消失，人与自然共生共存的和谐状态也不复存在。

无论是外祖父个人对自然生命的敬重、还是丽莎采取的对生命的拯救行动、原住民时期人与自然的共生共存，都更进一步地说明了弗拉纳根提倡的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伦理思想，都在指引安娜回到自然中去，发现自然世界的美，热爱自然世界并与自然共存。在被丽莎拯救动物的经历及她所讲述的原住民故事影响下，安娜决心开始过另一种生活。

安娜的伦理意识的觉醒在小说中早有端倪，她的内心深处依然向往着自然世界。她梦到过自己“长出了像橙腹鸚鵡一样美丽的绿色翅膀”（192-193），向往自己飞到一个安静的、充满绿色的地方。她回忆曾经与大自然亲密相处的时刻，她曾经生活在老桉树的光影中，树枝、树皮与树叶沙沙作响，鸟儿在树上安家，所有的一切都充满了旺盛的生命力与自然美，“这是一个笼罩一切、令人陶醉、令人欣喜若狂的世界”（256）。“在黎明之风的触摸中、在正午的耀眼光芒中、在海风中、在茶树的沙沙声中，在自然的爱抚中，她感到了完整”（258）。安娜通过对自然的体悟与感知，重新确立了人与自然之间的联系，在这种生命共同体的包裹下，安娜的精神也得到了恢复。

在小说结尾，弗拉纳根出乎意料地用安娜的死亡再次将人与自然联系起来，将主人公与动植物融为一体来传达人与自然共生的理念，同时也加深了当下回归自然世界的紧迫性。在死亡来临的前一刻，安娜感到自己在飞翔，她在不断地变成曾经灭绝了的动植物，塔斯马尼亚虎、蜘蛛甲虫、桃金娘、铅笔松等等，她经历着每一物种被猎杀，被射杀，被开采，被毒杀，被烧毁的灭绝过程，每一种都依次消失了。安娜的死亡一方面意味着物种灭绝过后“人类不能单独生存”（256），另一方面更意味着安娜向自然的回归，与自然的合二为一。安娜在觉醒的道路上，意识到了只有在自然中才能获得生命的完整性，最终通过临终前身体的变形，更为深刻地向世人传达了人与自然的生命共同体意义。

只有将文学还原到其所产生的伦理环境与语境中去，才能更好地理解文学背后的深意。弗拉纳根创作本书的伦理环境是澳大利亚社会处于严重的生态灾害威胁之下，作家敏锐地观察到了自然生命与人类本质的内在逻辑性。西方传统的伦理价值判断建立在人与自然主客对立的基础上，其发展至今已经呈现出种种弊端。弗拉纳根正是借助对人类破坏自然行为的观察、思考，揭

示出人类对待生命时的道德溃败，以及人类本质的破碎化。弗拉纳根将对外部自然生命与人内在生命本质的思考成功地糅合在了一起，揭示了人与自然的互联性与同源性。秉持着作家的责任感，弗拉纳根在小说中详尽地呈现人类当下面临的生存危机，用正反伦理案例启发读者进行反思，给人类的未来提供伦理的启迪。弗拉纳根在《醒梦活海》中向读者所倡导的伦理观念，是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思想。这一共同体包括人类与其他生命物种的内在联系，与之命运的一体性。在弗拉纳根看来，人类只是深奥、神秘宇宙中的一种元素，和其他生物一样共存于世界，我们应该爱护周围的生命，因为他们也在支撑着我们。只有以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思想看待自然、回归自然、爱护自然，重建人与自然和谐相依的伦理秩序，人类才能拥有一个更加美丽的未来。

Works Cited

- 大卫·库珀：《纯粹现代性批判——黑格尔、海德格尔及其以后》，臧佩洪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年。
- [Couper, David. *The Critique of Pure Modernity*, translated by Zang Peihong.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6.]
- 笛卡尔：《谈谈方法》，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
- [Descartes. *Discours de la Méthode*, translated by Wang Taiqing,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0.]
-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
- [Engels, Friedrich. *Dialectics of Nature*, translated by the Compilation Bureau of the Works of Marx, Engels, Lenin and Stalin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Beijing: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8.]
- Flanagan, Richard. *The Living Sea of Waking Dreams*. London: Penguin Random House UK, 2020.
- 刘蓓：“生态批评：寻求人类‘内部自然’的‘回归’”，《成都大学学报》2（2003）：21-24。
- [Liu Bei. “Ecocriticism: Seeking the ‘Return’ of Human Beings’ ‘Inner Nature’.” *Journal of Chengdu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s)* 2 (2003): 21-24.]
- 聂珍钊：《文学伦理学批评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
- [Nie Zhenzhao. *An Introduction to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Beijing: Peking UP, 2014.]
-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A Basic Theory.”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2 (2021): 189-207.
- 。“Ethical Literary Criticism: Sphinx Factor and Ethical Selection.” *Forum for World Literature Studies* 3 (2021): 383-398.
- ：“人文研究的科学转向”，《文学跨学科研究》4（2022）：563-568。
- [—。“The Scientific Turn of Humanities Studies.”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of Literature* 4 (2022): 563-568.]